

為 · 我 · 香 · 港



- 陶君行
- 李鵬飛
- 張鑑泉
- 盧子健
- 程介南
- 許賢發
- 梁燕城
- 郭家明
- 陳毓祥
- 譚王葛鳴

吳水麗編



SEU 41084811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出版

HONG KONG POLYTECHNIC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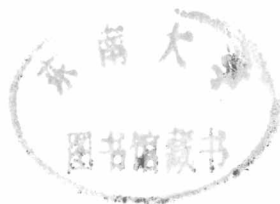
爲・我・香・港

陶君行
李鵬飛
張鑑泉
盧子健
程介南

許賢發
梁燕城
郭家明
陳毓祥
譚王葛鳴

吳水麗編

K928.96
8



K928.96/8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爲・我・香・港

DS
796
H74
W4C
1988
C2

編輯：吳水麗

美術設計：麥小雲

出版者：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九龍加連威老道 33 號

3 - 670071

承印者：多藝印刷有限公司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版

書點：ISBN 962-7267-13-9

定價：港幣二十元正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目錄

為我香港（代序）		1
為我香港承擔使命	陶君行	3
為我香港堅定信心	李鵬飛	9
為我香港促進經濟成長	張鑑泉	15
為我香港發展民主	盧子健	21
為我香港培育人才	程介南	27
為我香港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	許賢發	33
為我香港建立綠色樂土	梁燕城	45
為我香港文娛康體顯光芒	郭家明	53
為我香港廣傳訊息	陳毓祥	59
為我香港開創未來	譚王莒鳴	65
編後語	吳水麗	73
作者、編者簡介		75

為我香港（代序）

中央青年事務委員會定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舉行香港首次的青年節。

青年節的目標一方面在於促進社會人士對青年的關心和培育；同時也希望喚起青年人對生命的投入、對社會的承擔，以發揮青年人創新和進取的精神。

青年人不但是社會未來的棟樑，更加是推動今日社會向前邁進的力量。因此，青年人與所生活的時代和所處的社會是息息相關的。

一直以來香港是個充滿挑戰的城市。香港未來要面對的將更具挑戰性。香港的未來雖然要取決於一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情況，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取決於今日的青年可以和肯為香港做些甚麼？

香港是甚麼呢？有人說她是東方明珠、有人說她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有人說她是特別行政區……香港究竟是甚麼呢？香港就是我們青年人！我們就是香港！

今日如果我們能多一個青年不問香港可以為我做甚麼，而願意有「為我香港」的承擔，明日我們就多一分能建立一個我們心目中的社會的希望。

為我香港，我們青年人要致力於平衡的發展，建立能明辨是非，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性格。

為我香港，我們要發揮尊重別人、親親仁民愛物的精神。

為我香港，我們必須要堅持真理、維護正義，有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節氣。

為我香港，我們要致力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公義仁愛與及安定繁榮的社會。

作為香港的青年人，我們責無旁貸，我們別無選擇；我們願意一起攜手為我香港，因為我們就是香港！

（取材自中央青年事務委員會文件）

爲我香港承擔使命

●
陶君行

引言

每當年青一代聽到人家說：「你（我）們要承擔中國、香港未來的使命！」我們便不其然覺得毛骨悚然，完全不堪入耳，簡單覺得這一番說話十分「老套」。說實的，這般的提法根本對我年輕人來說，顯然無甚「市場」可言。因為在現實的世界裏，我們着重的，是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取最大的利益，並且強調最低之成本代價。雖然這是十分短線的做法，但這正是最受大多數人歡迎，最迎合香港「生存」的需要，最能夠得到羣體間支持，是爲個人利益着想的「最佳處世之道」。

因此，「不承擔使命」才於理性、感性層面上談得過去，若果硬要配套一些「泛民族理想主義」、「泛愛國、愛港情操」，或說甚麼「共負使命、建設香港」，作爲面對未來挑戰的座右銘，簡直就是不切實際的「謊言」。

究竟這些「謊言」爲何常在我年輕一代的腦子裏浮現？爲

何世間上仍有些人要突破或抗衡這股主流文化？其重要性何在呢？若要將這遍「謊言」化為「真理」，其任重道遠的使命又如何實踐？

為何「謊言」在香港沒有市場？

從現今香港市場規律而言，「承擔使命」的提法根本毫不值錢。我們可單從社會上對此方面少量的供求，便可見一斑。究其原因，我們可從香港的客觀背景分析。

香港自開埠以來，受着殖民地式的統治，我們對這塊「借來的地方」，跟英國殖民者一樣，視之為暫借的居所，對此地絲毫沒有感情，沒有歸屬感。香港只被理解為一塊彈力十足的「跳板」，作為我們尋找「終點或棲身之所的踏腳石」。既然我們大多數對此地沒有歸屬感，我們又何能虛泛地說承擔呢？

其次，香港自六七十年代以來，高速的經濟發展，帶來普遍港人無憂的物質生活。雖然部份土生土長的新一代已解脫上述歸屬感問題，但正正基於社會矛盾不嚴重，使生活美滿的年青一代，完全體驗不到社會潛在的問題與危機，直接使承擔的客觀需要大為減低。

另外，在殖民地的背景下，政治制度的不開放，使一般普羅大眾缺乏政治參與的機會，這不單剝削了我們的公民權利，更影響到公民意識的提高。試問在缺少活生生實踐的情況下，我們又何來對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知？何來提高我們對社會的責任感，以至於承擔呢？雖然殖民地的統治是歷史的「偶然」，並會隨着主權回歸而逐漸淡出，但身為香港人，伴隨的殖民地「被統治意識」，是否已經抹去？

更重要的是，要使我們對國家、社會的承擔意識得到強化，就有賴教育制度的教化。但回顧多年來的香港教育，無論在「質」或「量」上，都是徹底的殖民地式教育。從「質」的角度而言，統治者刻意「重英輕中」，特意設計一套抽空國家民族歷史的課程，不強調民主教育，不重視學生的獨立思考。

就「量」而言，她們刻意制訂一套富有分等分級的考試制度，製造一少撮「社會精英」；冀望他們成為社會上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減少他們的不滿或反動情緒；並以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方式，穩固己身的殖民地政權。

當然，將全部責任推到殖民地統治者的身上，是不公正地評價港人的「不承擔意識」。事實上，港人本身長久以來已流露着個人與社會割裂的潛在意識，使個人主義的情況泛濫。具體而言，我們深信「個人成功論」，即個體的成功與失敗，完全與社會制度等相關因素抽離。久而久之，我們便養成不關心社會的傾向，更遑論對社會作出任何承擔。

承擔使命重要嗎？

崇尚自由主義的港人認為，只要個體的自由選擇，在不影響他人自由選擇的前提下，這行動便被理解為道德的。是以，承擔與不承擔確是每個人自由選取的權利。既然對其他人沒有「嚴重的影響」，何必誇大其承擔的重要性呢？

就筆者個人的看法，這種觀點亦言之成理，無必要強加承擔的「重責」予任何人，這正是社會多元化的現象，根本無須改變這現實。然而，正因社會多元化的現實，持承擔理想的人，便應嘗試闡釋其論點，以圖影響他人。

從感性層面出發，隨着香港的成功，直接令大部份香港人都因此而獲益良多（雖然分配並不「平均」及「合理」），而且我們與此地一起成長，無論日後的苦與樂，我個人都願意與其他人共患難、共分享。

此外，為保障個體的利益，則必須確保香港的持續繁榮與安定。明顯的，上述兩者有密切的連帶關係，只要我們每個個體肯為整體的利益作出貢獻，則整體亦會惠及個體的利益。

何況，我們不僅可單獨解決香港內部的主要矛盾，亦對中國起着幫助的作用。須知香港不單在經濟與文化層面上作出影響，並能在政治發展方面，對中國大陸提供參考之經驗及示範效果。

承擔使命的障阻

但是，主觀願望往往受四週的客觀環境所轉移，而現實始終歸於現實，與個人的理想有一定的矛盾和距離。就當前的危機與考驗，港人如何自處？如何定位面對未來呢？

自六四屠殺後，港人的「危機訊號燈」已經亮起，無奈我們要面對失落、無助及危機感。正當我們義憤填胸，承擔促進中國發展的歷史使命時，我們卻立即被當權者的行徑破滅。他們甚至以「井水不犯河水」、「支援反革命動亂」等的欺人論調，打擊我們的參與熱誠。而現實偏偏就有人連聲和應，但這就正正違反「一國兩制」的一國精神，即禁止港人作為中國人的一份子，關注及參與中國的未來發展。這是與「主權回歸」的概念有所違背，兼且打擊港人對祖國的認同感。

如何承擔使命？

事實上，香港的未來就有賴中國的發展前景。只有中國朝向民主開放的方向，香港的前途才有客觀基礎。但究竟這基礎要等待多久才能確立呢？港人又可以扮演甚麼角色促進這進程？上述的難題確實無法提供一套「即時見效、一針見血」的方案。這正需要我們多番反省、思索及尋找出路。

經歷過八九中國民主運動的洗禮，我們清楚理解民主發展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只有少數人執掌政治權力的國家，其悲慘的局面是可從中國的鎮壓民運的事件驗證的。這不單剝奪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亦使國家的政策得不到廣泛參與及支持，令原本的經濟矛盾演變成政治危機。

在明確定立此發展的目標後，便了解民主運動的發展型態，是一漫長的鬥爭歷程，沒有一蹴而至的道理。現在，雖然經歷短暫的失敗和挫折，但只要我們立下決心，不斷的奮鬥，民主的花朵必會在中華大地盛開。這是改變每個個體主觀取向的具體方式，因為只要我們不絕望，中國便有希望。

再者，在面對未來挑戰的時刻，我們要隨時作出犧牲或付

出代價的心理準備。因為港人在前一階段的參與中，從未預計過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即有關港人與中國現政權的關係等問題。但如果我們要堅守爭取民主的價值觀，並為此長遠目標而作出努力的話，本身短期利益的付出，是須作謹慎的考慮。站在現時的境況中，堅持事實、原則及價值的人，已經越來越少。身為年青一代，未來的主人翁（雖然至今從未做過），這正是考驗我們毅力的日子。雖則日子難過，但「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情操，是現實社會需要來抗衡主流的。

而這方面的思想準備，亦體現於穩守香港的原則上。要建設穩定繁榮的香港，建立一個民主制度，為香港、對中國，都是莫大的裨益。所以，承擔的擔子正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們要做其「承擔班子」，在中國政局不穩定之時，我們仍能處變不驚；在民運再次發生之時，我們能作思想上準備，為此而作適當的參與及支援。

我們的角色

如何介定自己於中國、香港發展中的角色，是最難解決的問題。面對現今最艱難的時刻，這條路最不易尋找方向。在年青人而言，這正是我們最寶貴的光陰，是作抉擇的適當時機。

因此，我建議大家考慮以下的角色：

（一）反省者：當前，我們要反省作為香港中國人的身份，如何自處？如何面對未來？究竟我們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有多少？在殖民地的教化下，面對回歸祖國的必然現實，我們的殖民地意識已經摒除了多少？作為既得利益的一羣，是否願意客觀地檢視社會的問題？努力為社會不公義的事情伸張正義？減少個人主義的泛濫呢？……

（二）學習者：要建立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加強對社會的歸屬感，必然要建基於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始不會流於過份理想化，易受誤導，及作出非理性的判斷。但極端地作理性的思

維而不求實踐，並且絲毫沒有感情，亦是致命傷。年青年人要本着熱誠、幹勁與毅力，不斷求取進步；不時作自我批判，容納異己的意見，修正己身的錯誤，並且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鍛煉民主性格；才是學習的表現。

（三）參與者：實際的參與正正是反省及學習的必要條件。若果只作「空想的反省」及「理論的學習」，是不足夠的。香港正處於一個爭取學習、實踐民主的契機，是年青一代改寫歷史的時刻。我們要把握這不可錯失的良機，堅守原則與價值，從參與中反省、學習，為實踐「承擔理想」而努力。

（四）榜樣者：要使虛弱的次文化得到突破，與主流的價值觀抗衡的話，我們便應以身作則，做其榜樣，身體力行，為引領他人實踐理想鋪路。

總結語：

「從來就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這正是承擔使命的座右銘。在現實世界裏，這句話是「謊話」！持有這種觀點的是「阿Q」？不是，不是！

雖然理想常常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相當遠。但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將兩者拉近，將理想實現。世間上沒有「僥倖的成功」，更無不勞而獲。過份天真於命運、過份安於現狀，是最不切實際的做法。

這是一個「闖」的年代，就讓香港年青一代，懷着赤子之心、不屈不撓的精神，以港為家，共同為承擔建設新中國、新香港而奮鬥到底！

為我香港堅定信心

●
李鵬飛

三十五年前，我乘搭葡國商船來港，香港給我第一個印象很差，很多人居住在山邊的木屋，比起上海差得遠了。我不明白為甚麼母親叫我一個人來香港，到埗後亦沒有親人，所以由父親的朋友作出安排，入了清水灣的三育中學就讀中二。因為自己的程度差，又不會講廣州話，所以感到非常的孤獨。周末放假時，同學們都回家，自己因為沒有家，只有把時間放在打球和讀書上，這大概是造成我日後有獨立的性格的原因。到一九五七年底，母親與弟妹由上海來港，我亦由寄宿的三育中學轉讀培英中學；才能享受一下家庭的溫暖。一九五九年中學畢業後，父母親一定要我去美國讀書。我很怕去美國，因為自己讀的是中文中學，英文底很差，根本不會講，所以不喜歡去美國。但是聽從父母是做子女的責任，所以硬着頭皮，坐了三日飛機才到達紐約，這也再次開始了我獨立的生活。到了美國後，漸漸習慣了那邊的風土人情，亦了解到美國人的生活情

況；看到美國的繁榮富有，地大物博，人才濟濟，科技發達，所以大學畢業後，就在美國居住和工作。我的工作為電子設計工程師，我那時很喜歡美國的工作。在美國七年，漸漸把中文都忘記了，亦不想回香港來。我又喜歡美國的一切體育運動，尤其是美式足球，所以從沒想過要回港工作。但七年沒有看見過母親，他亦不想去美國，所以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因為想見見母親，我就由美國回來香港。

一到香港，我有了一個新印象。在離港七年後，香港起了變化——香港人變了有生氣，建築物多了很多，彌敦道我亦不認得了。那時香港的新興工業是電子業，我是讀電腦的，在母親的勸喻之下，就在港找工作，這也就開始了我在港生命的一頁。我在香港結婚，我的兒女都在香港出世，我持有的是 CI（身份證明書），香港就是我的家。

在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在台灣公幹時，收到了當時港督麥理浩勳爵的電報，邀請我做立法局議員。我當時不相信，以為是朋友拍電報與我開玩笑。雖然麥理浩勳爵在一九七七年曾經參觀過我所主持的安培泛達電子廠，和有時與他共進午膳，但我不相信他會邀請我做香港立法局議員。我收到電報時亦想辦法調查，但得不到結果；香港又打風，不能當日回港，所以沒有答覆。過二日回港後打電話給他，才知道是眞事，就這樣開始了我參政的生涯。

當時的心情是做三至五年算了，怎知在一九八二年底，香港前途、一九九七的租約，成為了熱門話題。身為立法局議員，我認為一定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香港人服務，當時我見香港商界人士不斷去北京，北京的領導人要收回香港。香港人心惶惶，我就想為什麼沒有香港人去北京講述香港人對香港前途的擔心？為什麼中國要收回香港而香港的一切制度與中國有很大的不同？香港人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這些問題不斷地在我的腦海中思考。我當初決定，如果我有機會去北京，我一定會實實在在的講述給北京領導階層聽。在一九八三年的二月，

我收到了當時新華社副社長李菊生先生的來信，邀請我組團去北京見北京領導層的人物；而我亦義不容辭的組團前往北京。當時的團員有張鑑泉、周梁淑怡、郭志權、李柱銘、何承天、李國能、阮中鑒等等。我們一齊工作了三個多月，為香港前途的問題研究最佳的解決方案，提出了我們的看法。

當時中英談判還沒有開始，當我們從北京回來，帶着中國的信息。當年七月，歷史性的中英談判開始了，香港人亦很熟悉中英談判的情況。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雙方簽訂協議，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將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我們的前途亦訂了下來——香港進入了史無前例的過渡期。而一國兩制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構思，能否成功沒有人可以確定，但是身為香港人，住在香港，家在香港的人，這個構思是一定要成功的，如果不成功，則會成為世界歷史上的大錯，而最重要的還是香港人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能否擁有現在擁有的一切，例如一切自由、法治的社會及經濟的成果。我相信這就是我想提及的信心。

信心是一種心理因素，不能以度量衡來測驗。那信心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信心是人為的，你以為你對香港前途有無信心才是真正的問題。在研究這個問題前，我們一定要看看以前香港的成就。香港今天與我在三十五年前到港的時候有太大的區別。

香港今天是一個國際矚目的城市，是國際上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擁有世界上最大貨櫃吞吐量的港口；小小的香港居然是全世界第十一大的貿易地區。我們的成衣、電子錶、玩具出口世界上首屈一指。中國的開放政策，令到中港兩方得益，中國已經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伙伴，而香港亦是中國的最大投資者。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有超過二百萬人為香港廠商製造商品出口，這一切都是事實，到了九七，這一切會起變化嗎？這亦就是一個信心的核心問題。香港人如對將來有信心，那香港將

來的發展和對中國的四化都會有莫大的貢獻，如香港人對前途沒有信心，那問題就大了。

信心在我來說是一種表現。今天香港人所面對的問題很多，但沒有任何事情比信心問題更嚴重。自從中國學運、北京六四事件後，香港的移民潮更加嚴重，移民潮亦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作為香港社會的領導者之一，我怎樣去思考和解決這麼嚴重的問題呢？

首先，我認為那些移了民的，已不把香港作為他們的家了，用不着去擔心他們在其他國家的生活情況。我們要思考的是怎樣去搞好香港的工作，令到不想移民和不能移民的香港人將來有一個可貴的家。移民潮給香港帶了人才外流的現象，所以我們首要面對的問題是怎樣培訓我們的年青人，給他們更多讀大學的機會，下苦工去訓練他們；所以我多年來一直主張擴大香港的大學和理工的學位。我亦知道教育經費非常昂貴，但是香港不培訓人才，就沒有香港，所以我非常之高興港督衛奕信爵士在十月十一日的施政報告內，把大學和理工的學位增加，是把我們教育政策重點放在第一位。我們投資在我們年青人的身上，就是投資於將來。我多年來的游說終於看到了成果。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有了人才，香港才有將來。

第二方面是怎樣令香港更加國際化。在這方面，兩局議員的十六個常設小組正在研究，我們不但要國際人士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參與，更加需要國際人士對香港多方面有興趣。如果要達到國際化，我們要從基本方面做起。香港的英文程度現在有退化的現象。英文是一種國際語言，亦是國際的商業語言；所以加強英文的訓練是一定要做的。香港的國際價值在於香港是否可以維持我們的國際地位，我們的年青人切不能忘記這一點。

第三方面是香港的內部建設，這亦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港督在十月十一日宣佈龐大的內部建設的決定正是一枝強心針。香港新機場、道路網、貨櫃碼頭是世界上最大工程之一，亦是

香港歷史以來最大的計劃，預算的經費會超過一千億港幣，香港政府的決心由此而見。

我亦藉此機會講述一下我對一件重要問題的見解，那就是中港關係。無可否認，六四事件令港人失去對前途的信心，對中國領導人處理中國學運的手法我們不一定要同意，但是我們需要靜思中港關係——中國與香港是不能分開的。大家想想如採取敵對的態度是否對兩方有利。我的見解是不可能有利，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但是我們要分清楚發表意見與敵對。以我觀察，現在中國領導階層對香港有成見，而香港一部份人亦對中國有成見。在不久的將來，這些成見一定要化解，所以我認為未來兩年，立法局必須改善中港關係。立法局是香港的立法機構，亦是本港重要的政治架構，他的成員不能不考慮將來與中國的溝通，互相尊重，互相諒解。香港的將來是每一個香港人關心和關注的問題，今天的社會領導者，一定要為將來的香港培養接班人。我自己深信香港將來是大有發展的。香港今天的地位，今天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已經成為各國注重的太平洋區的中樞。我亦深信中國亦重視香港的地位。香港對中國的四化已經作出了貢獻，將來更加會作出重大的貢獻。所以我相信在各種問題下，香港的地位沒有變。香港人的勤奮，香港人的鬥志，香港人的成就都是事實，這些事實不會一朝一夕改變的。還有七年多就到九七，在這過渡期中我期望香港人穩守崗位，努力奮鬥，更加開闢各國市場，成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令到香港人有歸屬感，建設香港的基本設施，這樣香港的將來是一定光明的。

我想起三十五年前的香港，和今天相比，確是天淵之別。在十月八日，無線電視邀請我主持一個「齊來許個願」的運動開幕儀式時，我提及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是唇齒的關係，我的願望是「中國國泰民安，香港繁榮安定。」我希望香港人對香港將來有信心不是空談，而是建築在事實上。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是建築在香港人的身上。香港人的精神是百折不撓的，我們